

第七章

駐美空軍武官



第1節 奉派美國

自1952年5月至1955年11月，我在華府當了三年半的駐美空軍武官。這段日子對我一生有很大的影響，不但增廣了見聞，也對美國獲有較深的瞭解。在知識層面，光是讀了一千多份《紐約時報》，就已獲得無可衡量的知識。其他在長官、同事及中外朋友處，也學到了很多。我的隨行眷屬，也都獲得人生難得的寶貴經歷。

1949年大陸撤守，空軍第十大隊移駐台灣嘉義。周至柔總司令問我：「是否願意去美國當空軍武官？」我因大隊剛到台灣，一切需要安頓；而美國才又發表對華白皮書，人心惶惶；台灣局勢正風雨飄搖，我不能、也不願在這個危疑震撼的關頭，離開我的袍澤和部隊。所以我回報周總司令：「不願在此時離開台灣。」

1951年，我奉調空軍總部，那時周將軍即將調升國防部參謀總長。空軍有些人事變動，我覺得不太對勁。所以請示周將軍：調我去美國的意向，是否仍然有效？他說：如我有此意願，他可上報。那時我仍兼總統座機駕駛員，報告上去後卻久無批覆。於是，我向經國先生探詢，而他的回答則是：「與老先生保持關係很重要！」當時的我，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只覺得在空軍總部我已不願再待下去！後來才明瞭經國先生的用意，是要我留在老先生身邊，才能更上層樓。我向來不善攀附，所以那時也沒有往這方面想。

幾個月後，終於批准我去華盛頓，擔任駐美空軍武官職務。於是我把總統座機機長的職務交給汪正中，並在一次由台中飛台北的任務中，把他正式推薦給總統。

奉命之後，我就到國防部第二廳報到「受訓」，主要是領我的旅費。那時聽說國防部二廳有個陋規，就是外派人員，須將所得拿出一部分，交給二廳作為同仁的福利基金。好像派去國外的人，都發了橫財似的！但是卻從無人向我提此要求，所以也可能僅係謠傳或少數人之間的陋規而已。

在離台之前，我把我的那輛別克轎車賣給國防部，作為二廳廳長賴名湯將軍的座車，因為他早就表示喜歡那輛車。售車所得的錢，剛好夠我全家赴美的機票費用。而我所領的旅費，就作為後來在華府的安家費，以及抵達後頭幾個月的開支費用。

第2節 赴美就任

1952年4月底，在辦好一切出國手續後，我帶著瑛華及四名子女，還有從大陸帶來的幫手張延慶等七人，搭機先飛東京。其時么女淑凡才七個多月。抵日時我國駐日軍事代表雷炎均和他太太Pearl（羅匪珍）十分親切地接待我們，並將我們安頓在帝國飯店。那時帝國飯店是東京最大的飯店，客人多為美國人，餐廳的盤碗刀叉極為高級。據說在二次大戰中，惟恐被炸，該飯店曾把貴重的東西都埋在地下；而今戰事已過，他們就挖出來

再用。我們在東京住了四天，遊覽了附近的名勝，如富士山、熱海、日光、鎌倉等處，並承當時我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何世禮將軍的款宴。何代表很瀟灑，他與俞大維博士素為熟稔，爾後我們也偶有往來。

5月初，我們全家搭上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大型客機離開東京。為讓小孩休息，我們也訂了一個床位。飛機上相當舒適，還有酒吧，餐飲也很考究。飛到夏威夷，又住了兩天。淑凡感冒，由下榻的旅館請來醫生為她診治；三個大孩子和我夫妻，也曾稍做遊覽。復於5月11日飛抵舊金山，在老友Donald王的家中休息。他原為中國航空公司的飛行員，後來代表中央航空公司，駐美辦理採購事宜。他是第二代的美國華僑，夫妻極為厚道。我們到達的時候，他剛剛完成在聖馬刁（San Mateo）自建的住屋，是一棟三間臥室的木造房屋，相當美觀！以我這個土中國人來看，自建如此一棟房子，實在不可思議！後來才知道，在美國這種事並不奇怪，因他們人工貴，很多東西都可預鑄；祇要把kits買回家來，就可自己動手，拼湊搭建。到現在連小飛機都可「自裝」了。

5月12日我們搭「星座號」客機，抵達華盛頓國際機場。由當時還無深交的李大為上校迎接我們，他是陸軍裝甲兵團的軍官，是吾兄復得的朋友。他很熱誠，為我們在查爾司頓旅館，訂了一個三間房的套房。旅館很老，每週租金不過百餘美元，但很方便舒適。我們在華府的頭幾天，都在找尋合適的房子；最後以二百三十

元月租，搬進麥金利地區（McKinley Place）的一間小洋房——樓上三間臥室，樓下客廳飯廳、廚房和衛生間等，還有地下室。我們一家住也算不壞了；而且又靠近很有名的岩溪公園（Rock Creek Park），那是我們在華府三年多經常去野餐及遠足的地方。

第3節 工作環境

我工作的地點，是在麻州大道上的一處三層辦公樓的武官處，正面對著中華民國大使館，這是華府的使館區。同樓中尚有陸軍及海軍武官處，陸軍武官先是皮宗敢少將，他是留英的，後調任總統侍從武官；繼任他的是蕭勃（信如）少將，是戴笠的人，與我們不太來往。海軍武官是柳鶴圖上校，他曾在英國格拉斯哥（Glasgow）受訓數年，英文造詣很深，我們兩家過往較密。在語言上，柳對我的幫助很大；後來他曾任我駐獅子山國大使和駐荷蘭代表。我們兩個人還合用一位秘書 Barbara 徐，她原籍德國，是我國早年外交官徐道鄰的太太，那時寡居華府；我們共事三年多，相處融洽。

另外，交往較多的，是大使館一等秘書顧毓瑞（Joseph）及他太太 Leola（王璉卿），前者是著名學者顧毓琇之弟，後來曾派至「鴨骨頭」〔是顧特別給厄瓜多爾（Ecuador）取的別名〕當大使；Leola 則是上海聞人王曉籟的女兒。顧氏夫婦倆都善交際，在外交上為我政府做了不少事，也頗受顧維鈞大使的賞識。可嘆的是那時外

交官的待遇微薄，他們住的房子不大，而為了省錢，多在家中請客；備餐及招待均親自動手，但館中同仁也多互相幫忙。在這種克難式的外交下，顧氏夫婦還是交了很多外國朋友，替國家做了很多外交工作。

第4節 顧大使和毛邦初

我們的館長是顧維鈞博士，他是我所認識的外交官中歷練最深、同時風度最好的一位。有時我們需要給報館去信，表達一些意見，在名義上是用個人出面，而實際上則是表達政府的立場。對於這種文件在擬好後，都必須經過大使核閱。有時用字不恰當，顧博士看後常謙虛地說：「我們把這個字（或這句話）改一改，好不好？」他的語文程度在國人中已屬佼佼者，但他謙遜的態度與翩翩的風範，則更為難得。同時，在當時華府的外交圈中，就算他資格最老，也是唯一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簽訂《凡爾賽和約》的外交官。雖然那時國運日衰，但大家對他還是十分尊敬。很多場合，他都常請我夫婦一同參與，令我們受益良多。他也是比較秉持中國傳統的官員，不但在習俗上遵守中國規矩，說話時的用字遣詞也常引用古語。有一次他帶我們參加「五角大廈」（美國國防部）的會議，他交代我們最好是穿「號衣」（舊時代軍服之稱），弄得柳鶴圖滿頭霧水，不知其然。

顧博士也教導我們參加白宮招待會時應有的禮儀。

顧夫人出自名門，是印尼僑領黃家的人；著名的《生活》雜誌還曾對其家族做過專題報導。據那份雜誌敘述：有一個時期黃家掌控印尼的金融，富可敵國！因此她可能在外交場合中，發揮了相當的經濟力量；單就她那套純金的餐具，不但令我大開眼界，華府的媒體也常加以大幅的報導。她的態度頗為高傲，常訓誡大使館的太太們，不可穿開衩太高的旗袍等等禮儀規矩。有一次我陪她參加美國交際明星、曾駐盧森堡的女大使的宴會。到達宴會地點時，因無人在門口迎接她，她堅持不肯進門；直至主人出來歡迎，她才進去。當天所請的客人，多是華府名流，我無法一一記憶；但顧夫人那種高雅的氣質，卻令我至今難忘。

在我抵達華府時，中美關係正陷低潮，我的前任曾慶瀾上校（空軍官校四期畢業）不告而辭，未做任何交接。另外，毛邦初案也鬧得如火如荼。

毛邦初將軍很瀟灑，老總統很喜歡他，只是他個性上有些不在乎。1949年大陸撤退，政府派毛前往華盛頓。當時美國人剛發表對華白皮書，在美國瀰漫著一片「國府無望論」、「台灣不保論」。政府將一千兩百萬美元外匯，匯到華盛頓，交由毛邦初、俞國華、皮宗敢等三人保管，三人中又以毛邦初資格最老，官階最大。

後來毛邦初回國述職，正逢空軍改組，當時他以為有機會出任總司令，但沒發表。據說毛懊惱地回到美國，開始用國家外匯炒作股票。政府得知後，立即派金

庸的堂兄查良鑑去美調查，並請了李海律師；兩年後把整個帳查清楚，但只追回了幾百萬。毛邦初則退隱到墨西哥去。一代名將，晚景淒涼。

第5節 開展武官業務

由於我的前任不告而辭，又發生毛邦初案，讓我一上任即很棘手。幸好在南京時代派往十大隊的一位美軍顧問高登（D. Gordon）上校，任職於五角大廈。他得悉我派華府工作，就來看我，並說我的處境很困難，因為大家不知道「你究竟代表何方？」意即「台灣或中國大陸？」那是因為我的前任及毛案的關係，還有美國的白皮書，對那些不了解內情的美國人而言，確實令他們迷惘。多虧高登幫我安排，首先去拜見當時的美空軍參謀長范登堡上將（Gen. Vandenburg）。在進入他辦公室時，巧遇毛邦初將軍的助理王定邦上尉，由范將軍辦公室出來。大家都知道毛邦初與范的交情很深，常在一起玩牌。我與王的碰頭，頗使范登堡將軍辦公室的人覺得尷尬。范的助理蒙哥馬利少將（M/G Montgomery），竭力向我解釋說：「王的拜會是一般私人性質，並無官方色彩。」我則一笑置之。後來蒙少將倒與我私誼甚佳，對我的武官工作也幫了不少忙。

在當時那種情形下，首要工作就是重建中國空軍武官在華府的形象，確認我所代表的政府是中華民國政府。假如這些工作不能做好，則我的任務就難以達成。

所以在我上任後的頭八個月中，我無暇寫出有內容的「武官報告」；我不能為敷衍上級，而把一些報章和雜誌所登載的，編成「武官週報」或「專題報告」上呈，這點也獲得國防部以及周至柔總長的諒解。而那時我只能用有限的金錢和自我的赤忱熱心，去對外接觸，並全程參加華府所有可能出席的軍事或外交活動。

我夫婦馬不停蹄地各處走動，所幸家中有我們帶去的張延慶，幫忙照顧小孩，使我們免去後顧之憂。八個多月下來，由於顧大使的指導和館員的合作，總算跑出點頭緒來。我也就開始寫報告。寫得好壞，不便自己評價，但在任內有一份非正式報告，至今回想起來是覺得較有意義的。

那是在1954年，葉公超部長與美國務卿杜勒斯簽定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（*Sino American Defense Pact*）後，葉部長給了我一份條約的抄本。我看完後，即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。在信中我分析當時中美關係和台海情勢，我認為國共之爭，是政治意識之爭。現已簽署中美協防條約，我政府似可不必太擔心台灣的安全問題，而應全力發展經濟，改善人民的生活，以向中共及全世界證明：三民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經濟體制，是勝過共產主義獨裁極權的計畫經濟制度。現在台島的防衛已由美國分擔，我們大可不必花太多的財力在國防上，因有美國艦隊保護，中共應該不會攻打台灣。至於投資建軍，準備反攻大陸，則因所需財力龐大，非

我所能辦到。而美國也會依據協定，對我反攻大陸予以掣肘。我這項「經濟為主，軍事次之」的理論，在當時恐怕當局難以接受，甚或遭受誤解，所以只以私函方式上達給周將軍。

1966年3月12日，蔣總統對全體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講了一段話：「我本來希望國民黨同志不要提名我為候選人，因為才德兼備，對國家人民有貢獻的老同志很多。但是，最後大家仍然推我，我感到很惶恐。我今年已經八十歲，再連一任，還不能反攻，怎對得起國家？此次國民大會，乃是反攻前的最後一次會議，我們必須把握時局發展的樞紐，完成歷史的使命。」

撫今追昔，我們確實在準備反攻大陸上花了不少冤枉錢；假設我們把那些錢投資在經濟建設上，今天的台灣也許會更好。我覺得我們的經濟，因過分重視軍備，而晚起飛了十五年。試看日本在戰後的國策，就可證實我們的一些錯誤。更可惜的是，當年提高國家競爭力比現下要容易得多。因為眾所周知，在50及60年代，亞洲地區具有競爭力的國家尚少；時至今日才想提高競爭力，則會加倍困難了。我在1954年就以私函向參謀總長提出了「經濟重於國防論」、「反攻無用論」，而老先生在1966年還信誓旦旦，將反攻大陸作為國家最高的歷史使命。我與蔣公有完全不同的思考認知，而我偏偏又喜抒發己見，原意一心一意為公為國，怎麼也沒有料到後來造成我一生中最大的一場風暴。

第6節 幾位美國朋友

在武官任內，我與美空軍總部的人皆建立了相當的交情。最早是史東中將（Lt./Gen. Charles Stone），他是負責主計（comptroller）的參謀次長，二次大戰後，曾任美十四航空隊（駐華）司令。他夫婦均極友善，我們公私交往都很密切，有關我想要的資料，他都大力幫忙。當時美空軍推行主計制度不久，他們曾為我做了詳細簡報，我也把此制度介紹給我們空軍總部，記得後來是同學趙光漢，負責成立了空軍總部的主計署。此種制度之精神，在於對一切軍事的考量和動作必須成本化，也就是說：一切作為包括戰鬥行動，均要以金錢做考量。不可像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美國為了求勝，不惜成本，結果造成太多的浪費。換言之，以最低成本完成國防目標才是上策。

1954年，美空軍組團訪台，由史東將軍率領，他也邀我同行，這是彌足珍惜的友情。其後史東將軍曾於1970年代應我政府之邀再度來台遊覽；那時他的原配過世，續弦希克姆女士，是美空軍名將希克姆（Col. Hickam）之女，檀香山美空軍基地Hickam Field，即為紀念他所命名。

其次，是我相當熟稔的歐哈拉少將（M/G O'hara），他主管空軍軍援事宜，太太是英國人，我們兩家來往也很多。那時美援對我國很重要，認識這位主管，對我們很多方便。他亦曾帶隊訪問遠東（日本、台灣、泰國等

地），也邀我隨行。在台灣晉見過老總統，並與我方討論軍援事宜，相信對我國相當有幫助。我沒有隨他們去東南亞，但在回程中，卻在檀香山休息了兩天，住在威基基（Waikiki）海灘的陸軍招待所，並再次暢遊檀島。

另外與我熟悉的美空軍人員，尚有作戰參謀次長帕特里奇（Lt./Gen. Partridge）等，對我武官業務均有幫助。負責與各國空軍武官聯絡的，是美空軍總部聯絡室主任地山上校（Col. Andrew De Chean），他原籍法國，在二次大戰時加入美國空軍。夫婦倆均極和藹，對我們空軍武官的照顧很周到。美各軍部每年安排武官參觀訪問一至兩次，空軍武官團曾參觀在科羅拉多新建的美空軍軍官學校、哈特福德（Hartford，在康乃狄克州）的共和飛機製造廠及俄亥俄州的美空軍發祥地萊特－帕特森基地（Wright-Patterson Field）等；另外如有任何訪問參觀，他們都會盡量安排。武官團本身的活動也不少，都是酒會一類的玩意兒。好在外交官購物，如煙酒等均免稅，所以交際應酬起來，所費並不太多；特別是送酒給洋朋友，他們最為歡迎。

在我們大使館方面，因當時台灣處境尷尬，人員待遇微薄，因此士氣非常低落。顧維鈞大使一向是抱持「忠於職守」的原則，嚴守崗位，調和鼎鼐，與美方關係可說維持得相當不錯。據我觀察，一般館員則缺乏打拼的精神，只有顧毓瑞夫婦幹勁十足。顧身為一等秘書，但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，仍不斷保持對外連絡。他的那些洋朋友每次都在他家大吃大喝，毓瑞與他

們真的建立了很好的關係。其中最顯著的一位是國務院的中國科科長馬康衛先生，後來被派來台任美國大使。另外，有一位美陸軍情報官蓋洛維少將，也是毓瑞家常客，後來派往東京任麥克阿瑟元帥總部的情報處長。

第7節 社交活動

在華盛頓，除大使館外，尚有軍事採購團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）。前者是一位陸軍的韓將軍負責，團中設有俞大維博士的辦公室，軍購業務方面俞先生多有參與；而他與軍部的聯繫也不少，相信在那時期中，他與美軍建立了深厚關係，對他爾後返台就任國防部長有相當幫助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方面，中方代表好像是霍寶樹先生，此公愛好京戲，家中很是熱鬧。另外，譚伯羽先生大概也是那組織的一員；在蔣經國訪美時，曾到譚家吃飯，蔣譚兩家應該關係很深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另一位代表是俞國華先生，他在華府的住處與我們很近，所以來往較多。他太太董梅真不會開車，每有應酬，多半是由瑛華去接。在他們調離華府時，瑛華也去幫她整理行裝。等大家都調回台北後，俞任中央信託局長，因與蔣經國的關係，我們時常見面。後來我與蔣家「斷交」，也就少與俞家來往了。有人說俞先生是蔣家的「帳房」，我看這是有意的玩笑；但有兩次蔣經國在我出國時，給的美金支票（津貼性質），卻都是以董梅真的名字簽發的，證明他

們兩家起碼有通財之誼。

在美時期，尚有飛虎隊及美十四航空隊老隊員們的活動。美國人生活優裕，特別喜歡社交，並透過一些老同學們組織的俱樂部每年聯歡。此類「俱樂部」（club）不計其數，只要幾位退役的同事在一起，就可組織一個俱樂部，藉此歡聚，亦不失為好事。我們曾被邀請參加過十四航空隊俱樂部在托萊多（Toledo，俄亥俄州）的聚會；陳香梅女士一直很活躍，亦為那些退役人員所擁戴。有一次晚宴，是由富商Bunting太太作東，Bunting Bed在全世界都很出名，她住在托萊多城一家旅館（好像是Hotel Commodore Perry）的頂樓（penthouse）。房子很大，周圍都是花園，而花叢中卻置有香檳酒，供客人隨時飲用。最驚人的，是那晚有點冷，參加宴會的太太們不勝其寒，Bunting太太見狀，即取出一大堆貂皮大衣供她們禦寒，令那些太太大為過癮！我們大使館的人常說：我國在華府外交圈中，只有「一件半」貂皮大衣——一件是顧大使夫人所有；另一件（短大衣，故稱半件）則為大使館一位炊事人員的太太所有（那位老兄在華府開飯館，故有能力擁有此大衣），引為笑談。

第8節 任滿西行

我在武官任上，遇有假期，也常攜眷出遊，北至加拿大，南至佛羅里達，均有我們的足跡，只是到西岸的機會很少。故在結束武官任務後，全家開車由東

到西走了一趟。因是冬天，所以走的是南線，沿途風景很不錯，瑛華、治凡和我分別駕駛，開開停停，一共走了七天。

我們首先去喬治亞州的瓦利堡看望我的老友那單，承他全家人親切接待，過了一天純美國南方風味的生活。次日到紐奧良市停留一夜，欣賞那裡的法國風情，並在著名的法國餐館安東尼（Antoine）吃了一頓「大菜」。之後又去憑弔美國內戰時的古戰場。途經新墨西哥州時，也遊覽了極有名的卡爾斯巴德（Carlsbad）山洞。到了西岸，曾在聖地牙哥市觀光龐大的動物園。然後抵達洛杉磯，承蒙張學良將軍的「顧問」埃爾德先生（Mr. Jim Elder）招待，參觀達格拉斯飛機製造廠。那時DC-7剛出廠；後來聽說該機因設計不佳，而未大量生產。我們在洛杉磯玩了一天，又沿著美麗的海濱公路，開車到舊金山，住進美軍招待所。周至柔將軍的公子周一西，招呼我們玩了兩天。把那輛福特旅行車，以原價賣掉後，全家搭乘美軍運輸艦「帕特里克將軍號」（Gen. Patrick）經檀香山返台。我們從住進舊金山的招待所，一路到搭船返國，都是免費優待。美國人實在很慷慨。

1955年11月，船抵基隆港。自那時起，我的工作和生活，便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。



1954年在美空軍武官任內，與顧維鈞大使（左）攝於華盛頓雙橡園內。



1954年在美国，與抗戰時期來華助戰之飛虎隊隊員重聚。
我夫婦（左一與右一）與史東（曾任駐華美軍十四航空隊司令）將軍夫婦（左二及左三）、飛虎隊長陳納德將軍（右二）及其夫人陳香梅女士（右四）合影。